

算法推送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的引导

方黎^{1,2}

1.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2.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文化习性指向主体的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是影响主体文化选择与文化实践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推送深入介入并牵引着青年的文化习性养成,在联结并简化了青年与海量信息关系的同时,也对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带来一系列风险挑战:滋生信息串联样态,诱导内卷化效应,加剧圈层间隔阂,阻碍群体性协商。对于这一系列风险挑战的化解,可以从提升先进文化标识度,优化算法推送中的信息结构;营造文化共同体氛围,增加算法推送中的圈层契合点;培育青年主体性意识,引导算法推送中青年文化习性的自觉养成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以帮助青年在新的技术与媒介环境中充分接受先进文化的滋养。

关键词:算法推送;青年;文化习性;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C91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3.05.010

文章编号:2096-9864(2023)05-0081-10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推送不仅成为信息生产方在信息爆炸的数字环境中分析数据、笼络受众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成为诸多网民提取信息、进行文化实践的潜在技术诱导。算法克服了互联网时代传统信息传播范式超载的缺陷^[1],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网民们的文化习性,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与文化实践。这种影响对于成长于数字环境,并深度浸润于网络空间的青年而言尤为突出。当网络在时空双向度上密切介入青年的生活过程时,青年的文化习性愈发难以脱离算法的技术推动而独立养成。算法推送的背后隐藏着厚重的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于是,在看似热闹繁华

的文化实践中,青年的文化习性实际上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干扰青年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与正确的价值践履。目前学界虽然已经关注到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实践的关联,从算法对青年文化实践内容与方式的建构、其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但是,对于深度考察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习性之间关系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重点从文化习性的角度讨论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逻辑关联、内在风险和应对策略,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数字时代的青年文化研究,优化对数字时代青年文化的价值引导。

收稿日期:2023-08-0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22D009)

作者简介:方黎(1986—),女,安徽省霍邱县人,安徽医科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青年文化。

一、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逻辑关联

“习性”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的重要关键词,被视为“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2]172}。布尔迪厄认为,习性“包含了对未来的一种实践性指涉”^{[2]185},它代表了一种偏好与能力,是“一种以特殊的‘逻辑’(包括暂时的‘逻辑’)建构和理解实践的明确态度”^{[2]168}。在青年的文化选择与价值践履中,习性指向青年的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其中文化偏好代表了青年的文化选择与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文化图式代表了青年既有的文化知识构成与文化理解能力。文化习性在青年的文化选择与实践发挥着不容小觑的深刻影响:其一,习性是一个持续性建构的性情系统,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并“铭写在最强有力的对实践的掌握之中”^{[2]169},不断地对主体的文化实践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实践背后都有驱使其产生的文化习性因素。其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内在性、潜在性、可能性”^{[2]182}的,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文化习性驱使主体做出特定的话语与行动。其三,习性涵盖了主体的知识构成与价值取向,并以可变的姿态作用于主体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模式,这对于禀性未定的青年影响深远。由此观之,既然文化习性之于青年的文化实践如此重要,那么考察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就显得极为迫切。在布氏的理论系统中,习性不仅作用于实践,也建构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关系系统息息相关,这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419-420}的观点。如今,考察青年的文化习性养成,便需要联系网络空间这一时代条件所铺设的文化场景与关系模式而展开,其中,尤其需要观照的便是代

表着网络空间新的文化信息分发模式的算法推送机制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逻辑关联。

1. 算法推送创设出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场景

主体文化习性的养成不是独立与封闭的,它杂糅了主体整个存在时空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条件,这种氛围与条件可以被视为一种场景影响。这里的“场景”指的是主体文化习性的熏染资源与表意时空。对于青年而言,算法推送所创设出的文化习性养成场景是这样产生的:作为算法推送的一种重要技术方式——基于内容采制、内容分发、信息到达与接受的内容推送算法,首先破除了传统物理空间的信息与文化实践壁垒,将全球范围内的关联性文化信息汇总、呈现给主体;进而,将早期网络空间的信息漫灌归置为一个个精心编码的文化小时空,这种文化小时空一改传统文化信息传播的普遍性、大众化模式,以一种定制化的、分众学的形式传递给受众,算法推送下的文化小时空追求的是信息分发的精准与受众的有效接受。而这种围绕某些主体展开的、可以容纳无限关联性内容的文化小时空就构成了栖息于网络空间中主体文化习性的养成场景,构成主体的文化图式,作用于主体的文化偏好。倘若主体的网络介入度是有限与克制的,那么这种养成场景将不足以影响其文化习性的发展方向,然而,青年则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4]29}。青年的文化实践逐渐脱离了传统物理空间的代际传递模式,转而深度依赖于网络文化小时空,并且在智能化发展促成的虚实同构的技术背景下,青年对网络的深度依赖将变得愈发明显。于是,这种网络文化小时空将不断地“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5],构成了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场景。

2. 算法介入了青年文化习性的关系建构

正如马克思将现实的人视为“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6]一样,任何主体文化习性的养成都脱离不了特定时空的社会关系,对于好新求异、社交热度高的青年群体而言,这种社会关系直接构成了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群体参照系。而算法推送正在以新锐的技术推动力变革着青年的社会交往模式,进而介入了青年文化习性的关系建构。这种介入有赖于算法推送中常用的基于社交关系的推送与基于历史偏好的推送等技术方式。这两种推送均是建立在关系相似性基础上的,基于社交关系的推送会在分析用户社交数据的过程中,将与用户互动密切的他者所关注的内容,同步推送给用户;基于历史偏好的推送,通过分析主体的身份、兴趣等,对其在网络空间中文化的消费项目进行分析,将其归入某一类文化偏好群体,为其持续性推送同质性的文化消费内容。这两种推送模式表面上推送的都是信息,实质上却是建构起了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关系网,进而在算法推送所形成的文化小时空中,进一步强化这种关系建构。以青年热衷的“弹幕文化”与“网游文化”为例,青年痴迷于弹幕讨论与网游体验,不仅是为了满足文化表意与娱乐需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一文化场内,青年能够源源不断地接触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网友,在弹幕表意与网游组队中满足自我的社交需求。此外,技术的发展赋予了青年可以将物理空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化、将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现实化的可能,如各种粉丝饭圈的聚集,就是来自于共同的网络文化实践圈、共同的粉丝圈,形成了可信赖的亲密感与独特的连带关系。也就是说,算法推送不断强化青年交往的“趣缘”模式,加速了一个个网络文化圈层的生成,进而在圈层关系的建构中,不断将青年文化偏好、文化图式塑造成其所被归入的群体的文化习性模样。

3. 算法牵引着青年文化习性的动态变迁

正如布氏所认为的,文化习性是一个潜在

的开放性系统,它不仅持续不断地对主体的文化实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被塑造着。在新的信息分发模式下,算法正不断牵引着青年文化习性的动态变迁。这便涉及算法的技术原理。以青年惯用的小红书、B站等APP为例,在首次登录注册的时候,会弹出一个界面,其中涉及用户的性别、年龄、身份等主体特征,再综合考虑用户在不同文化场景中的趣味、偏好、主体既有的文化知识构成、文化理解力等因素,协同性建构起用户的文化习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空间的文化信息传播彻底变更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本位”逻辑,转而倚重网民的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实现“用户本位”的文化信息传播转向。事实上,算法推送的迭代升级就是围绕着用户的习性展开的,这一点让主体意识勃兴的青年十分受用。只是,算法在服务于青年所思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牵引着青年文化习性的动态变迁,这个牵引就发生在算法对青年文化习性模型的建构中,算法推送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空间文化信息的去向、不同文化信息的优先传播程度,以及受众对文化信息的取舍度与认知方向。具体而言,算法通过对青年身份特征的确认,根据青年具体的时空处境,对他们进行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的协同性分析,进而在高热度的文化信息推送中,不断迎合并强化青年的文化习性,并且这种推送与迎合是不能轻易地如同微信公众号一样被“取消关注”的,它会针对一个IP地址持续进行,由此,引导着青年文化习性在不知不觉中朝向算法所建构的模式动态变迁。

二、算法推送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风险挑战

作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种成果,算法的本意在于运用大数据与系统性的编码来

寻求高效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升信息处理的效率,联结并简化人们与海量信息的关系,这些无疑是值得赞赏的。然而,科技的跃进一遍遍地验证着马克思的警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3]776}算法推送亦是如此。技术与权力相伴而生,介入并影响了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青年文化习性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挑战。故而,从育人成才的立场出发,需要在明了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习性逻辑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新的信息分发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诸种挑战,进而为风险的有效规避提供学理依据。

1. 滋生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信息串联样态

由布氏对于习性的理解可以看出,文化习性涵盖了主体的文化偏好,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那么这种文化偏好实质上表征着主体的价值取向,这对于处于“拔节孕穗期”^{[7]329}的青年而言至关重要。健康的文化习性不仅需要青年主动地接受先进文化的化育,还需要青年能够在多样性文化并存的文化旋涡中,有识别美丑善恶的能力,这都离不开丰富多彩的文化滋养。然而,算法恰恰在个性化的文化习性场景推送中单一化了主体的文化偏好,在一味讨好式的文化信息供应下,造成了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信息串联样态。这里的“信息串联”一词类似于物理学中的串联电路理论,在串联电路中,只要有一条电路传递电流,整个电路上的电器运行都将受到这唯一一条电路的开关控制。而我们所指的“信息串联”是指在算法推送为青年所构建的文化场景中,算法逻辑控制了青年文化习性的取向,这个文化场景中的一切

信息源都与某种运算逻辑高度匹配,这种运算逻辑就如同串联电路的开关,符合运算逻辑的信息将像串联电路中的电灯一样统统被点亮,推送至场景中青年的文化消费圈内;而一切不符合这种运算逻辑的信息将被排斥在文化场景之外。在这种信息分发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之路被一串串被计算过的、价值内核相似的文化资源所填塞。而这种单一性文化资源的价值取向是有风险的,可能不利于青年文化习性的健康发展。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在^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红黑灰”三个地带的重要论述为例,来进一步阐释这种信息串联的危害。尽管我们期待算法推送出的文化场景是代表正能量的红色地带,持续用先进的文化资源来滋养青年文化习性的健康养成,然而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恰恰是各种亚文化、负文化的繁盛场域,文化实践热度高的青年更是各种文化势力争夺的对象,禀性未定的他们很容易被一些看似新奇热闹、实则有害的文化信息所蒙蔽。于是,在算法推送出的文化小时空内,一部分青年很容易陷入黑灰地带。而文化小时空中一条条串联式的文化信息,进一步强化了青年的文化偏好,身陷黑色地带的青年,倍增了持续黑化、走上邪路的概率;在灰色地带摇摆不定的青年,有可能因串联中信息偏好的变“红”而走向正确的道路,也有可能因串联中信息偏好的转“黑”而滑入黑色地带,而这一切都与算法计算的逻辑密切关联。

2. 诱导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内卷化效应

在算法推送机制所推出的文化小时空、所建构的习性模型中,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又面临着潜在危机,即内卷化效应。这就是戈登威泽所描述的:“当某种文化模式达到既定的程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红色地带,主要是由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黑色地带,主要是由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

度和形态时,既无法保持稳定的状态,也难以自我更新到其他形态,于是只能不断地在内部进行自我复制和精细化这样一种动态停滞的文化现象。”^[8]算法推送机制之所以容易诱导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内卷化,主要原因在于其在流量经济导向下,促成了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一种惰性的路径依赖。我们发现,在算法推送的文化场景中,每一时刻都有大量的程序工作人员凭借各式的信息编码,在揣测、比对信息消费者的文化习性,进而不断地为受众推送可能吸引其关注的文化信息,争夺网络流量。一些青年的文化习性在算法推送的介入下,惰性的路径依赖愈发明显,算法先是为青年推送出了一个个如同尼葛洛庞帝所言的“the Daily Me(我的日报)”,让每个青年都拥有一份个性化的文化信息清单;而当青年们一旦习惯并信任了这种文化信息获取方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文化实践的惰性,不断强化个人的信息茧房,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9]。虽然,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信息茧房一直或强或弱地存在,但是,资本操纵下的算法推送却将一些青年深度囿于娱乐有余、新奇过度但思想不足的信息茧房中,一点点蚕食掉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上升空间。由此,便诱导了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内卷化效应,大量平面化、边际效益递减的消遣文化绑架了青年的文化取向,固化了青年的知识构成与理解能力,阻碍了文化图式的延展。文化习性养成的轨迹偏离了上升性的轨道,在既有的知识结构与趣味取向中重复性转圈,超越性丧失,由此造成了文化习性养成中的目标偏离与功能内耗。也就是说,原本被期待有高远的文化追求、有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与时俱进的文化态度的青年,可能会沉溺于博己一乐、不用动脑的文化场景中乐不思蜀,而对外部的世界不屑一顾,堵塞了文化习性的上升通道,进而遮蔽了文化实

践所应有的全面育人价值。

3. 加剧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圈层间隔

良好文化习性的养成既需要纵向的优良传统的传承,又需要横向的多样性先进文化的滋养。马克思早就告诫过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从育人目标来反思算法推送机制中的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便会发现,算法对个性化文化场景的推送、青年关系网的构建、文化习性养成的牵引,实质上是以“人以群分”的思维模式将青年群体圈层化。由此,青年的文化习性养成也就会遭遇圈层化阻隔的风险。这种阻隔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多样性文化影响的阻隔。在开放性文化环境中,文化实践的单一中心圈模式被多点多面的文化实践圈模式所取代,而算法信息分发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生态圈层化样态。在以用户为导向的编码策略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多少种文化需求,就有多少类文化圈层。文化需求旺盛、文化取向可塑性强的青年就是这样被归入各个圈层的,青年们大都有其钟情的文化类 APP 与门户网站,并且拥有同一个文化类平台的青年们又被归入不同的偏好群内,在算法为其建构的关系网内,青年沉醉不知归路,渐渐将自己与外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相剥离。更可怕的是,这种剥离不仅失去了全面发展的文化习性所依赖的多样性文化滋养,还可能将青年与积极向上的主导文化阻隔开来,造成一些青年的文化取向、文化图式与官方的文化倡导发生严重断裂,如近年来大量圈粉的“丧文化”与“耽美文化”等,进而在青年群体中滋生出一系列不良的文化实践。二是代际传承的阻隔。人生每个阶段的文化习性存在差异本是常态,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播中,这种差异与文化良性的代际

传承并不对立。然而,算法推送强化了网络空间文化习性的代际差异,青年们在一个个既定的文化小时空所圈定的文化实践场域表意、创造,其中有着算法作用下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一些青年的文化习性被算法的信息分发权力所牵引,与趣味相投的同辈群体的文化习性高度绑定,大家能够彼此认同、理解相互间的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而对父辈的、传统性的文化取向采取躲避甚至不屑的态度。同时,他们凭借熟练的技术,进一步弱化了父辈群体在网络圈层中的话语权,代际文化习性的圈层阻隔就在一些青年群体的不理不睬与父辈们的困惑无助中日益明显。

4. 阻碍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群体性协商

在现代多元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格局中,良好的群体性协商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1]的必要前提,从青年的文化实践视域来看,青年的文化图式中应该具备积极的协商意识与协商策略。然而,在串联的信息取向、内卷化效应的滋长、圈层间阻隔的加深等一系列风险的蔓延下,算法顺理成章地将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推入又一风险区,即群体性协商的受阻。这一风险的酝酿过程是这样的:在算法所圈定的文化小时空内,除少数文化实践自觉性较强者外,很多涉世未深的青年甘于在算法推送的信息中打发时光,不自觉地强化了特定的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随着信息串联程度的加深,信息茧房愈发坚固,文化习性养成的内卷化效应凸显,青年对算法所推送的文化圈层的依附程度日益加深,进而加深了与自我文化习性一致的“圈友”间的情感,网民间传统的弱联系发展为“圈友”间的强联系。圈内青年对与自我类似的“圈友”的文化习性表示出极大的好感与尊重,而与其他“圈外人”的文化偏好与文化图式交集不够,彼此间因文化习性的不同可能会疏远与抵抗,引发圈层间的群体协

商失败。这种协商失败还体现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群体极化,以至于一些青年的文化习性与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倡导相背离。例如,一些人喜欢关注社会阴暗面的信息,那么算法会竭尽全力地投其所好,为他们不断推送社会中丑与恶的信息,而若这些人不是抱着社会研究或是积极改变现状的想法,那么他们的文化习性可能就会在持续性的负面信息茧房中“黑化”。如若这部分群体又是某个文化圈层内比较有话语权的主体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还会强烈吸引“圈友”朝向与自我文化习性相一致的方向建构,如此,错误被放大,群体极化出现,进一步增加了风险社会中群体协商达成的难度。

三、算法推送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的引导理路

布氏的理论启发我们,文化习性是动态可建构的,那么,面对算法推送机制与青年文化习性的逻辑关联,以及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风险挑战,我们始终应当秉承解决问题的初心来理解算法背后的技术趋势与育人成才之间的关系,尽可能规避、化解新的技术导向下,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风险隐患,积极地引导青年养成正确的文化偏好、均衡的文化图式。下文主要从育人者的立场探讨如何积极地介入与引导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这涉及文化分发与消费两大维度,即既需要育人者主动作为,通过提升网络空间先进文化标识度、营造文化共同体等方式,来优化算法推送中的文化信息结构,破解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出现的单一性信息串联样态、内卷化、圈层阻隔等风险;又需要积极培育青年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帮助青年自觉养成积极的文化消费习惯,使其主动选择先进文化的滋养,积极破圈、发展良好的群体协商能力。由此,让青年有意识地成为算法推送的技术驾驭者,自觉涵养与社会主导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偏

好与文化图式,以期实现让算法服务于青年健康成长的育人初衷。

1. 提升先进文化标识度,优化算法推送中的信息结构

无论是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单向度、充满风险的信息串联样态还是低质重复的内卷化效应,实质上都折射出算法推送中的“智能不足”,无法有效解决推送的资源与人的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主要依赖文化信息与用户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环境特征、热度特征、协同特征^[12]来建立联系的推送模式,仍然是一种较为低水平的人工智能,在标签化的文化供应中,无法承诺被推送出的内容都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故而,在整个可能被推送出的信息流中,需要宣传思想工作进一步提升先进文化标识度意识,优化算法推送中的信息结构,以此来保障算法推送中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营养供给,从而降低信息串联样态中的“黑”“灰”风险,并在先进文化主导的信息结构建构中促使青年文化习性的上升式养成,避免其陷入内卷化的风险。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点。

其一,以议程设置来提升标识度,使先进文化能够被算法推送。在算法推送所营造的文化场景中,形形色色的文化信息对整个信息结构的建构能力取决于其信息标识度,而这一信息标识度又依赖其议程设置能力对用户的吸引力。由此,先进文化资源只有成为青年所关注的“热搜”,进入其“话题榜”,才能引导青年的文化偏好,进而成为青年文化习性的涵养资源。但网络空间先进文化的这种议程设置又不等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文化书写,主流媒体很难通过单纯的资源推送引导青年的关注,而需要更为广泛与多样的互动介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算法推送中引导青年看到先进文化,还要通过热点话题讨论,引导青年参与什么、关

注什么,牵引着青年不断去发现先进文化的话题域。

其二,以文化编码来提升标识度,使先进文化能够被算法留得住。如果说议程设置着力于解决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资源到达的问题,那么文化编码就是解决消化的问题。青年只有理解了算法推送出的先进文化,才能有效地将其融入自我文化图式,进而消化为自身文化习性养成的养料。而与之相应,先进文化也只有被青年所消化,才有被进一步关注的可能,也才能被个性化的算法推送所留住。基于此,我们更需要借用算法的数据处理与分类技术,针对不同青年群体的身份特征、理解水平、兴趣偏好等,有针对性地进行先进文化的编码,在呈现形式、话语表达、场景搭建等多个层面下功夫,让先进文化不仅能被算法筛选到,还能留得住,成为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养料。

2. 营造文化共同体氛围,增加算法推送中的圈层契合点

如果说提升先进文化标识度意识,优化算法推送中的信息结构是提高先进文化在算法推送中占比的重要手段的话,那么通过营造文化共同体氛围,来丰富算法推送中的圈层契合点,则可进一步发挥先进文化对于青年文化习性的滋养力,促使算法推送中的诸多文化场景间有更好的价值共识,以此来逐步消弭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圈层隔阂,增加群体性协商的可能。而这种文化共同体与圈层契合点的达成既要依靠先进文化的价值引导,又要凭借网络行动者的风尚引领。

其一,以文化文,整合圈层间的价值共识。算法推送虽然客观上便利了青年的入圈,然而,这种圈层间的阻隔并非不可弥合。在应对态度上,较之于理想主义的“破圈层”来实现文化的大同而言,整合圈层间的价值共识,不断增加圈层间的契合点,更符合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规律,

符合青年文化图式均衡发展的要求,也更容易达成青年文化实践的群体性协商。这种价值共识的整合离不开以文化文的介入,前一个“文”指代主流文化圈所倡导的先进文化,后一个“文”指代其他多样性文化圈。算法推送出的文化圈内都有其特定的辐射场与受众,而不同文化辐射场是否发生交集的重要条件在于文化间的同源性^[13],以文化文的关键点便在于强化文化圈的“同源性”:其一,强化价值同源性。主流文化圈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7]318},既要团结算法推送出的一切非对抗性价值取向的文化圈,引导其朝向与自我价值取向一致的方向变化,又要挤压不良文化圈的生存空间,“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丑恶”^{[4]180}。其二,尝试话语同源性。话语同源性是在强调主流文化圈影响文化他者话语实践符合“他律极”要求的前提下,关注一种文化反哺,即青年文化实践的话语表达对传统文化实践的反哺、亚文化实践的话语表达对主流文化实践的反哺,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借鉴而非价值的逆转。话语作为沟通媒介,其同源性的达成,更利于不同文化圈的价值共识实现与圈层交往,均衡青年文化认知图式,促进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群体性协商因素生长。

其二,以人化文,注重网络行动者的风尚引领。在算法推送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逻辑关联中,交往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算法正是通过对青年交往关系的建构才进一步影响了青年的文化偏好、文化图式。所以,营造文化共同体氛围,来实现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圈层间交往与群体性协商的畅通,需要一种积极的关系引导。这里提出的以人化文便是一种关系引导策略,其中的“人”指代积极的网络行动者,“文”指代被推送出的诸类亚文化圈。以人化文的实践机理在于通过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网

络行动者作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与传播者,在“人”的网络交往辐射圈内,以多样形式传播先进文化,更积极地引导自己所参与的其他圈层的文化实践正面发展,以此来增加算法分发机制下圈层间的价值契合点,搭建群体协商的桥梁。这里的关键是人的培育,积极的网络行动者虽然必须是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实践者与传播者,但其活跃的文化实践圈却不能只是主流文化圈,我们更期待的是在算法所分发出的诸多文化圈中,尽可能多的积极的网络行动者引领文化风尚,引导圈内青年的文化习性养成。其中,人的培育需要育人者的刻意为之,他们既可以是育人者本身,也可以是优质青年偶像,更可以是有号召力的青年网民等。所以,在算法分发机制中,青年文化习性的引导不仅需要我们关注文化是如何被推送与消费的,还更应该去思考,如何播撒一颗颗先进文化代言人的种子去引领算法推送中的文化风尚。

3. 培育青年主体性意识,引导算法推送中青年文化习性的自觉养成

算法对青年文化习性进行建构与牵引的背后是青年文化习性养成的主体性缺失,正因为一些青年缺乏恰当的主体性意识,他们才陷入无聊的串联信息中不可自拔,文化习性的养成受阻,陷入内卷化效应不自知,在狭隘的亚文化圈中沉迷,与大多数积极的同辈间、代表传统的父辈们等社会群体间缺乏文化的沟通与协商,而这一系列问题的纾解离不开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主体性的确立。面对算法这一新的信息分发模式,青年需要“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57},而不是单纯地被技术牵着走。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注青年的价值培育与审美教育。偏好与趣味是习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而言,正确的价值培育与审美教育可以引导青年形成积极的文化偏好与文化

趣味,进而涵养健康的文化习性。在算法的技术导向中,这种价值培育与审美教育的成效对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主体性意识的确立至关重要,青年唯有确立正确的价值选择与审美趣味,才能不被信息分发技术左右,自觉将自我归为先进文化实践圈。故而,文化环境越是复杂,越要加强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越要坚持以文化人与以美育人的协同,越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4]180}的文化产品滋养青年,让他们能发现体悟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4]166}。而这种价值培育与审美教育不能止于网络空间的引导,更多的是贯穿到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种熏染,这就需要一种育人的社会合力,关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风尚导向,用有营养的文化资源滋养青年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而拥有积极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文化实践主体,无论在怎样的信息分发模式中,都会有自觉选择先进文化资源的主体意识。

其二,均衡青年的文化图式。如果说价值培育与审美教育是着力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一种倾向性引导,那么文化图式解决的便是青年文化习性养成中的知识构成与理解能力的问题。在媒介技术催化下的文化旋涡中,青年往往从自我的文化图式出发去打捞文化资源,进而,这种打捞的痕迹被算法记录,并予以认可与迎合。而若想让青年能够自觉养成积极的文化习性,不断驱动自我选择有营养的文化,那么,重要的前提便是育人者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为青年铺垫先进文化的文化图式,让青年有理解并选择先进文化的知识储备。其中,学校教育须承担起重要的育人使命,毕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保障下,义务教育是所有适龄青少年成长中的必经阶段,而高等教育的受益面也在日益扩大,可以说,学校教育对于青年文化图式的建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学

校教育不仅要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场,还要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场与创造场。在大中小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中,教育者要分阶段地对青少年进行先进文化的知识传授。一个长期接受先进文化熏陶、拥有坚实的先进文化知识储备,对文化的先进性有基本的辨别、筛选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对自我文化习性的健康养成负起责任。

其三,跟进青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技术发展到了何种阶段,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就应该跟进到何种程度。我们不能单纯地站在技术评判的角度来看待算法与青年文化习性养成间的关系,而应该站在人对技术的运用角度来看待新的技术模式对于自我发展的影响。算法的信息分发模式虽然对青年文化习性的养成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然而,算法作为一种新技术产物,也可以造福于青年良好文化习性的养成,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青年有着高水平的媒介素养来提升自我的主体性意识。诸如时下流行的爬虫软件,它就运用了大数据处理与算法分类技术来帮助用户筛选信息,青年便可以通过类似软件来辅助学习资料的搜集、时政热点的研判等。当前这种媒介素养教育的跟进,不仅在于引导青年辩证、全面地看待新的媒介技术对于社会生活与自我发展的影响,还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公益性的网络公开课等青年便于接触到的形式,来不断科普各种媒介技术的实践机理及其应用价值,帮助青年提高利用媒介、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成长的能力。将这种技术分析与技术运用能力的提升放置在其文化习性养成的过程中来看,便有助于帮助青年运用算法这一新的信息分发技术来服务于自我的文化习性养成。

四、结语

青年是文化实践的活跃者,是信息技术的

弄潮儿,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所重视的“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骨干和栋梁”^[14]。对于这一关键群体,我们期待他们有着积极健康的文化习性,在自身的文化实践与文化修养中既能够承续前辈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又能够在同辈的广泛交流、借鉴中美美与共;还要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引领时代的文化新风尚。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育人者给予青年充分的关注,跟进分析与引导新的技术与媒介环境下青年的文化生活样态,以期更好服务于青年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喻国明. 人工智能与算法推荐下的网络治理之道[J]. 新闻与写作, 2019(1): 61.

[2]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5]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293.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8] 刘世定, 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4(5): 96.

[9]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8.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70-471.

[1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8.

[12] 喻国明, 杜楠楠. 智能型算法分发的价值迭代: “边界调适”与合法性的提升: 以“今日头条”的四次升级迭代为例[J]. 新闻记者, 2019(11): 15.

[13] 方黎, 孙超. 网络文化的生成场域、风格走向与价值分析[J]. 学术界, 2020(6): 149.

[14] 习近平. 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N]. 人民日报, 2019-07-17(01).

[责任编辑:毛丽娜]



引用格式: 方黎. 算法推送机制下青年文化习性的引导[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5): 81-90.